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政治学与 中国政治研究

学科发展现状评析

郭苏建◎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政治学与 中国政治研究

学科发展现状评析

郭苏建◎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郭苏建主编;程熙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ISBN 978-7-208-14174-2

I. ①政… II. ①郭… ②程… III. ①政治学-研究
②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0 ②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8644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

——学科发展现状评析

郭苏建 主编

程 熙 袁 倩 吴 双 译

张 博 吕同舟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93,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174-2/D·2954

定价 52.0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研究
——学科发展现状评析 /1

第一部分 学科领域的现状评估

- 第二章 中国政治研究：该学科发展现状综述 /13
- 第三章 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 /45
- 第四章 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 /66
- 第五章 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与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 /89
- 第六章 中国的环境政治：关于这个议题的文献综述 /109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第七章 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139
- 第八章 关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充分利用多样性 /152

第九章 中国政治学的抉择：方法论实证主义还是
方法论多元主义？ /170

第十章 美国政治学重建运动及对中国政治研究的
启示 /183

第三部分

中国政治研究：科学化还是本土化

第十一章 对科学探索、学术自由和启蒙之关系的
反思 /203

第十二章 中国崛起语境下我国政治学发展的
困境 /219

第十三章 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反思 /246

第十四章 “接轨”还是“拿来”
——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261

第十五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中国特色的
政治学 /290

第一章

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研究

——学科发展现状评析

郭苏建*

经过 30 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在高校中,诸如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西德尼·维巴(Sydney Verba)、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阿伦·利普哈特(Arendt Lijphart)、戴维·科利尔(David

* 郭苏建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中国政治学会前会长,美国《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主编,美国“Rowman & Littlefield—Lexington's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系列丛书主编,《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执行主编,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共同主编。198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直至 1991 年出国留学,获田纳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美中关系、可持续能源与环境、治理理论、民主转型和经济转型等。主要学术成果包括数十篇学术论文(包括 SSCI 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十几篇)及 20 多部中英文学术著作和编著:《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民主转型:模式与后果》、《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与治理》、《中国政治与政府:权利、意识形态和组织》、《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中国市民社会与治理》、《重塑合法性:中外经验》、《中国探索善治》、《中美关系 30 年:分析路径和当代问题》、《环境保护政策:美中西部地区比较》、《中国环境危机:国内应对与国际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大中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政策》、《中国外交的新视角》、《亚洲共产主义转型政治经济学》、《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条件》、《中国政治发展的挑战》及《21 世纪的中国机遇与挑战》等。

Collier)、詹姆斯·马洪(James Mahon)、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tori)、加里·金(Gary King)以及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等国际一流政治学家的著作和文章仍然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和阅读。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和中国政治都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国际关系领域,比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斯蒂芬·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等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及其外交政策行为的研究。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学者开始不断质疑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内发展出一个“中国学派”。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他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民族特性、知识传统,以及地方性知识和国情。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且目前是检验和评估中国政治学现状的时候了——该学科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成就、挑战和趋势。

在这个使命的感召下,由斯普林格出版公司(Springer)发行的《中国政治学刊》(*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以下简称JCPS)刊登了一系列专题论文。这个专题由14篇兼具回顾性和前瞻性的文章组成,探讨了中国政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JCPS的主编,我有幸汇集了这么多国内外优秀学者的智慧来共同探讨这么一个有意义并且极其重要的话题。本书就是他们智慧的成果,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推动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特别是,本书的目的还在于扩大这些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推动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反思和对话,并给中国政治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如上所述,这30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学术研究方法的诸多改进。作为区域研究专家,中国政治研究已不再“孤立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而是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JCPS和其他政治学期刊的简单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已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并且达到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准。今日的中国政治

研究已远不同于昔日的传统汉学研究。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上,还表现为我们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的诸多议题。林恩·怀特(Lynn T. White)在本书他所写的章节中指出:“中国和亚洲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可以有助于扩展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实际政治运作的缜密研究。”

本书内容包括几个方面:围绕中国政治学中充满争议的重要议题所展开的讨论,关于该学术领域理论创新的最新研究综述,关于西方政治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关系的讨论,运用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学逻辑和方法。本书各章既有经验的研究也有规范的研究,既有理论解释也有案例研究。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研究内激烈争论的命题,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土性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和方向。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是这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我希望本领域内的所有学术同仁都能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

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最接近本书的是寇艾伦(Allen Carlsen)、高敏(Mary Gallagher)、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墨宁(Melanie Manion)编著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和罗伯特·艾什(Robert Ash)、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高木诚一郎(Seiichiro Takagi)编著的《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7)。前一本书是关于数据资料和方法的研究,后一本书是涵盖政治、历史、经济、外交及安全在内的一般性的课题研究。我们的这本书有别于这两本文集。本书专注于对中国政治研究这个领域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状况的评估,强调中国学者在中国政治学科发展和转型中的特殊作用,集中讨论最具争议的问题、挑战、机遇、成就和趋势。比如,在中国崛起及其文化传统的背景下是否存在“中国学派”的“范式创新”?中国政治研究是否应该抵制对西方理论的套用,推动本土的理论发展?中国政治研究是应该科学化还是去科学化?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将影响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研究。

本书包括3部分,共15章,每部分探讨一个主题,分别是“学科领域

的现状评估”、“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和“中国政治研究：科学化还是本土化”。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政治研究的现状。无论在内容、主题、理论及方法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中国政治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林恩·怀特认为这得益于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努力。

林恩·T.怀特撰写了第二章“中国政治研究：该学科发展现状综述”。他观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政治研究者的兴趣和问题更加广泛了，同时与之相关的调研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这首先归功于来自中国大陆出生的华裔美籍学者的努力。其次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数据的不断公开，使学者们更容易获取所需资料。同时他还认为，对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政治研究要求在方法上和理论上进行创新，从而有可能丰富现有的美国政治学。

在第三章“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一文中，彼得·穆迪(Peter R. Moody)认为“理解中国政治要诉诸中国文化”这一论断是真理也是常识，因为其适用于任何社会的研究。但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文化研究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被人们视为无助于经验政治理论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应该和理性选择理论相互兼容。由于“理性”没有一种统一认识标准，而且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于理性的理解也各有千秋，所以文化背景就能为理性选择理论提供必要的特质内涵。否则理性选择理论很可能沦为平庸的陈词滥调。

第四章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随着中国政治转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研究也发生了变化。该章作者杨光斌和李森(音译)对这种变化作了一个概述，特别关注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其中的贡献。除了分析西方理论是否可以运用于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作者也回顾了在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国家—社会分析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领域时使用的本土方法和理论。他们认为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的原创文章都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并将理论发展和实际政治相互联系起来。

景跃进和王国勤撰写了第五章“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与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学科的恢复、西方理论的引入和方法论的进步，中国政治学不断成长。作者从1990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发表的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入手，研究西方理论如何

影响中国学术。作者发现不同的西方理论流派都被引介到了国内,每一个流派都对中国的政治研究产生了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学和研究方法的理解。

第六章是“中国的环境政治:关于这个议题的文献综述”。吴逢时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内环境政治研究的中英文文献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综述。其中涉及的主题有国家和环境治理、公共意识和环保社团,以及环境对外关系。作者的研究和评估涉及两个核心问题:其一,环境政治与一般的中国政治的区别在哪里?环境保护研究能否对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洞察力?作者发现对环境政治的研究不仅能提供新的实证材料,而且能对已有的中国政治认识和分析框架提出全新的挑战。

第二部分侧重于从认识论视角探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以及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更关注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如何获取及能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关心知识的内容、方法和研究设计等具体形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和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争论的一方强调科学性、普遍性和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则注重特殊性、历史性和传统内涵。前一类学者质疑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和比较政治和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中国政治研究在增进政治知识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毁灭整个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应该争取中国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以及去“中国本土化”,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进行富有成果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但另一批学者则强调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质疑唯科学主义或者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积极倡导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多样性。他们试图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强调其发展路径的特殊性,而不是遵循一个统一的发展路径,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

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狭隘或缺乏社会相关性。

在第七章“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中,钟杨讨论了能否在比较政治的逻辑中实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毁灭整个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政治的逻辑应和其他比较社会科学一样,都是一个采用时空变量来取代国别名称解释政治现象的分析过程。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社会科学家应该分解“中国特殊条件”和“文化因素”,以取得对这些条件和因素的更深刻的认识意义,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把这些条件和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高度。简而言之,作者更倾向于争取让中国的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以及去“中国本土化”,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

第八章是由阿尔佩曼(Björn Alpermann)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充分利用多样性”,旨在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多样性的认识来激发对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争论。首先,西方社会科学并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而是对共同目标和价值进行广泛的争论的学科。其次,中国政治研究正逐渐采取更多的定量研究,但一些中国学者不应该对这种定量研究趋势抱有敌视态度,并将其视为对整个领域的全面占领,而应该将其视为对方法论的多样性的补充,是一种兼顾传统方法和多层次研究方法的契机。问题的关键是学者要尽量利用多样性,并且在尊重彼此观点的前提下,从事富有成果的跨文化对话。作者认为存在于定量与定性、政治学与区域研究及中国和西方学术之间的漏洞和分歧需要通过扩大多样性来填补和消解。

在第九章“中国政治学的抉择:方法论实证主义还是方法论多元主义?”中,乔恩·R.泰勒(Jon R. Taylor)探讨了方法论应是实证主义还是多元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和美国当初的情况一样,中国政治学正在经历一段相似的过程,即试图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因素。中国政治学是否应有一个统一路径?是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还是使用已在公共管理中运用的多样性的方法论?或许一种结合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的混合方法更加有益于中国学术的发展。

任雪莉(Shelley Rigger)在第十章“美国政治学重建运动及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启示”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学的“改革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借鉴。美国政治学会的“改革运动”(the Perestroika Movement)旨在唤醒人们对于美国政治学内在问题及其争议的关注。这些问题包括研究的破碎化、不连续性,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及狭隘而缺乏社会相关性。作者总结了“改革运动”所提出的批评,并提出中国如何才能可以不重蹈覆辙。

第三部分关注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挑战和趋势,重点关注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之间本体论的争论,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关注对现实存在的研究,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本质、身份定义和意义,“中国”和“他者”之间的范畴区别,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开始由西方引入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到政治学科的建立与转型。在第三部分的文章中,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中国政治研究如何缺乏科学性,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研究成为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学的一部分。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中国政治研究具有一种世界性、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视野。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服务于政府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知识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制约。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体系。学者与官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使学者依赖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们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他们认为提倡学术开放对于当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和学术职业化是最必要的。另一部分作者则检讨了西方范式、概念和方法在研究中国政治上的不适用性,因为西方理论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差异、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他们倡导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研究。还有一部分作者则认为迅速发展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将对海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产生很大影响。

在第十一章“对科学探索、学术自由和启蒙之关系的反思”中,作者杰弗里·C.艾萨克(Jeffrey C. Isaac)探讨了科学研究、学术自我反思和启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学术自由对于科学研究是必需的条件,也是人类尊严、自由和民主的基石。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的普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其实现也必然是充满曲折的。这个过程实现必须基于公共启蒙和民主化的话语伦理。作者通过与俞可平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学和增量

民主等问题的对话阐释了这个主题。

第十二章“中国崛起语境下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困境”由何包钢撰写。作者观察到中国的崛起必然改变世界权力格局,随之也会影响政治学的国际发展趋势。在中国国内谈这个问题的人很少。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如何在当代特征上和战略方向上影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作者首先分析了构成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三种含义及其产生的三种模式。其次说明了中国政治学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阻碍——诸如夜郎自大、学术圈的官僚化及缺少学术自由。作者概述了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几个争论。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些争论,并且使中国政治研究向科学化发展,作者对如何平衡科学和人文提出了四个论点以及实现的四大策略。作者还概述了关于中国政治地方化和中国独特性的争论,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朝更加国际性、全球性、普世性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的体制更加倾向于鼓励和宣扬中国的特殊性,以维持其政治合法性。

吴国光撰写了第十三章“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反思”。作者对于中国的政治研究中文文献进行了搜集和评估。这项研究其实涉及有三个层面。第一,作为政治学分支的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尚不成熟;第二,该领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政治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界线不清;第三,学术和制度性的职业化是政治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王绍光在第十四章“‘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中对政治学的本土化进行了理论思考。他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理论和实践基础。他试图回答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是否有可能?如何本土化?王绍光认为本土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本土化意味着要做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没有本土学人的自觉和积极的努力及自我反省,本土化是不可能的。

第十五章是最后一章,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作者乔恩·R.泰勒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由两场革命和贯穿整个20世纪的战争、国内战争和政治动荡共同塑造的。在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政治学受阻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怀疑。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迎来了一场文艺复兴,同时受到西方理论和本土概念的影响。和美国相似,中国政治学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关于不同学术传统

影响、关键作用、未来发展的积极且有益的辩论。这场正在进行的论战意味着中国政治学还在发展中。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政治研究自有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泰勒回顾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和成长，强调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迅速发展，这必将影响海内外的学术发展。

(译者：程熙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讲师)

第一部分

学科领域的现状评估

